论嘉庆中衰的原因

魏克威

嘉庆时期（1796—1820）是清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堪称重要。而历来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嘉庆之前，即使是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论述很少。本文拟对嘉庆中衰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以期共议。

赫赫大清，嘉庆中衰，究其原因，虽专论绝无，但论及所见，令人称疑。有言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发展为必然结果者，亦有言是农民起义打击所使之，更有人说是嘉庆帝为政过宽所致，若把这些问题说成是嘉庆中衰的原因似乎有理，但疵漏太多，实难成信。如前者，为什么封建社会固有矛盾必然要在嘉庆朝爆发，而不在乾隆朝或道光朝？中者，较大的农民起义在嘉庆曾爆发过几次，可是，白莲教起义在嘉庆九年就已平息，后期的天理教起义仅一年即剿灭，并未构成足以使清王朝衰败的威胁。后者嘉庆帝的确有为政失之过宽的事例，但纵观嘉庆一朝，他宽严相济，恩威并施地办理政务则应视为主流。凡此种种若称其为中衰之因，似觉不妥。那么，其因何在？

从嘉庆朝种种有关史料记载来看，清廷库银逐年亏空，与各级官吏的巨额贪污、用公款大行贿赂有关。农民起义与官吏横征暴敛，强贪明占有关。围剿义军的多次失利，清廷为此耗费巨额军费，与将帅不和互相倾轧有关。河工久治不绝又与官吏的偷工减料、分肥入己有关。而嘉庆的一些治国方针措施难以实行又与官吏上下串通，各行其事，有法不依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切都预示着嘉庆朝横行的、亘古未有的腐败吏风，是促成其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衰败的主要原因。

一

嘉庆中衰源自前朝。清王朝自入关后，经顺、康、雍三帝的苦心经营，到乾隆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已达到有清二百六十年间的鼎盛阶段。也就在乾隆时期皇帝“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① 的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前后两次用兵金川，耗用库银七千万两。用兵西陲又耗银三千万两，两次南征缅甸用银九百一十万两，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用兵安南又耗用白银六千三百七十万两。烽烟所及西南达尼泊尔，东北至库页岛，疆域虽得以扩张，而军费所需，清史绝无。此外，用兵台湾所耗近千余万，廓尔喀、西藏用兵所需尚不在内，总计乾隆一朝所用军费约在一万二千万两以上。而当时国库收入每年仅三千余万两，其余亏空皆出自前朝所存库银。乾隆四十六年又诏准以虚额名粮归入武职“养廉”，于是又增兵六万，每年又增额三百万两，二十余年又用去七千万两白银。当时大学士阿桂就力陈其弊，指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殊难为继。”② 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不以阿桂之议为然。虽然嘉庆继位后两次议裁兵额，终不能恢复原数。如此巨额支出，使历年国库积蓄如流水一样耗费殆尽，这就为嘉庆朝孕育了衰败的条件。

财用上的匮乏若经新朝的治理尚可在短期内恢复，而吏风的败坏则一时难以整肃。由于乾隆帝"性喜夸饰，往往思突过前人而适滋流弊。"③做了许多尚奢崇盛、好大喜功、遗害四方的事情。自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他五次西巡五台，四次东谒三陵，六次南巡江浙，五到曲阜，至于秋猕木兰、山庄避暑，自十六年以后更是每岁夏秋两至，帝行所至沿途点缀，务求华美，每处供设达二、三十万不止。"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而督抚借机办差，勒派属吏"遂致使仓库亏耗，海内财赋之殚、民间风俗之坏，实基于是"。④对此，乾隆帝在他退位后也愧疚地评述道"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⑤并告诫嘉庆帝不准南巡。

然而，奢根已植，腐风已成，皇帝的崇奢为已渐败坏的吏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利用职权贪污纳贿、结党营私更使腐败的吏风进一步加深。他为相二十年，贪污白银八万万两，以当时清廷岁进七千万两计算，所得赃银足抵国库十年收入还强。⑥在他的庇护下，乾隆朝的几起重大贪污案，如国泰、王亶望、福崧、陈辉祖等案，都与和珅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在他经济上大肆贪污的同时，在上层集团内部更是网罗党羽，擢用亲信，顺者昌、逆者亡。"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⑦朝中上下从尚侍到督抚尽出和门。凡有奏折要先经军机处审阅，若与和珅意稍有悖辄以卷中笔误为名留下不报。实无笔误则设法寻出疵漏，以指甲划印留下。若与诸大臣同阅卷，取舍皆由和珅一人决断，朝中皆称他为二皇帝。就连嘉庆继位后的四年中有事要奏报太上皇帝，也要由和珅代奏。

由此可见，在乾隆中后期腐败的吏风已露马迹，欲衰的国势已见端倪。当我们欲探求嘉庆中衰的原因时，乾隆皇帝所留下的基业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这个基业已绝非是昔日"环海升平，重熙累洽"的鼎盛，而是一个国家经费"岁支则难为继，故不计久远，足为将来财政之忧，"腐败的吏风也已经形成的局面。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嘉庆朝才开始了全面的衰败。

二

各级官吏的贪污纳贿，进一步削弱了本朝的经济基础。嘉庆四年（1799）初三日，太上皇帝乾隆崩逝。嘉庆开始独执朝政。对于前朝之弊和当朝之患，嘉庆心里非常清楚。尽管当时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经济持续凋弊，库银累年匮减。但诸多问题中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吏治问题。可见此问题在当时之重要。初四日，嘉庆就撤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的职务，五天后又将和珅逮捕并抄其家，又七日以大罪二十款将和珅凌迟处死。但恶习已成，积重难返，"内有聚敛之臣，外有贪黩之吏"的清王朝，已绝非是处理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问题。但由此足以可见嘉庆帝已认识到吏治问题在当时构已成了对政权的严重威胁。

尽管此后嘉庆帝殚心竭虑制定了很多整饬吏治富国强兵的措施，然而，前朝积患，后朝祸发。在当时朝野臣宦不行政令，上下串通大肆舞弊的风气之下，这一切显得十分软弱无力。面对已形成的腐败之风，不仅久治不衰而且愈演愈烈，就连嘉庆帝自己也感到是无力回天了。从《仁宗实录》和其他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庆一朝最大的祸患莫过于吏治腐败，它与农民起义，持续凋弊的经济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由此构成了清代中衰的大趋势。对此嘉庆帝在他继位十八年后曾无可奈何地说："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

朕虽再三告诫，舌弊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随笔泪洒通谕知之。”⑧这段话可谓是对他当政十几年来官风吏治的一个总结。这些“尸禄保位”的官吏们在嘉庆时期集我国封建社会中历朝污吏贪官的种种恶行劣迹于一朝，进行了丑恶的表演，使清王朝自嘉庆时起，开始了全面衰败的历史。

上下串通贪污纳贿是这一时期吏风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在军营中一些将领借围剿义军之机大发横财已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就在嘉庆继位前后湖北白莲教爆发了起义。为剿灭白莲教，到嘉庆四年时清廷已拨军费七千万两，可是“教匪”非但未平且有愈盛之势，而且各路军队“兵丁衣服褴褛，几同乞丐。”经查原来湖北道员胡齐仑为贿赂各路领兵大员，以犒赏为名私自扣留二万九千余两，馈送给毕沅、庆成、鄂辉等人。⑨几年后通过详细调查，除胡齐仑外各局官吏都不同程度地有贪污馈送行为，总计各领兵大员共受贿达六万余两。就连到湖北为其父吊丧的重臣德麟，地方官也以购奠仪的名义送给他四万一千一百五十二两白银。至于其他久驻湖北的大将额勒登保、德楞泰等都不同程度的有受贿行为。⑩虽然当事者都受到了惩处，但农民起义的多年持续和日下的官风，对清王朝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嘉庆帝似乎也从中悟出了白莲教久剿不绝的原因，就是由于各路领兵大员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可以得到远远超过赏银的贿赂银两，“所得盈千累万”，可以大发其财，而功成受赏只能得到加封五等的封赏。所以，为了钱财“以养寇为肥己之计，以糜帑为饱橐之资。”⑪这无限的纳贿银与有限的封赏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差额，使各路领兵大员完全放弃了清王朝的利益而一心贪黩谋私。

此类事件在嘉庆朝绝非湖北一省所有，也就在胡齐仑案发同时，四川军费也露出了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嘉庆四年九月上谕曰：“湖北支用军需为数尚少已有此弊端，何况川省军需不啻湖北数倍，且胡齐仑只系道员，又况川省办理军需之宜绵、英善、福宁等经手日久，岂有不滥行提用馈送结纳之理，不可不切实严究。”并当即将川省军需大员福宁解职，警告他“如能自行供明呈出底帐，并将宜绵、英善从前在任时底帐和盘托出，尚可宽贷，傥饰词含混，一经查出，伊能当此重罪乎。”⑪看来四川贪污军费的数额还要高出湖北数倍。

庞大的军费开支就这样被各级官吏以种种名义侵吞掉。尽管嘉庆对此进行了严厉的处理，但贪占军费的案件屡发不止。嘉庆十年六月大同总兵恩承阿因迟放兵丁粮饷案发后畏罪自杀。经查恩承阿自嘉庆四年至九年将大同镇所辖中、左、右、前四营的军费，除公项开销外其余全被恩承阿贪污。就是这样一个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贪污军费数万两的人，他的顶头上司山西巡抚伯麟还多次向嘉庆密奏，称他“为人老成操守好，率属公正实能整饬营伍。”不仅如此，各营军官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对其贪污行为竟无一人告发，看来他们“若非同染指，焉肯缄默不言。”嘉庆也深知“各省营伍中此等侵肥克扣情事恐亦在所不免，但朕不为已甚，此时不肯纷纷查究。”⑬如果深究下去，各地类似案件若全部暴露出来形势将更难以控制。

由于军费被大量侵吞，军士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各路军中哗变、集体逃跑的事件屡有发生。如：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饷，于嘉庆五年八月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倭什布长期克扣粮饷，兵士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宁陕新兵也因粮饷被扣于十一年六月哗变，十二月又有四川绥定府新兵之变，十二年正月陕西西乡新兵也因停饷反叛。

军营中的侵吞军费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耗费了清廷的经济实力。而比军营更为严重的

文职官员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的行为则更强烈地动摇了嘉庆朝的经济基础。

嘉庆十一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奏报：究出司书私雕假印勾串舞弊案。据查，自嘉庆元年至嘉庆十一年，共计二十四个州县，用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手段共侵盗库银三十一万余两。在作案过程中州县与书吏竟明目张胆地约定好：每虚收冒支银一万两，给司书及说事人使费银二、三千两不等，事后书吏将案卷销毁或将案卷数字挖改掉。案发后胡季堂等八个督抚及藩司州县官吏共计二十人受惩。此后不久，湖北又查出武昌五县多年来也有合伙侵欺私改案卷票据的案例。三年后又查出工部书吏王书常等利用每年修筑土木工程之机伪造大员姓名私雕假印，向内府户部先后十四次冒领库银近千万两的重大贪污案。⑭用伪造印信的手段贪污巨额银两固属恶劣，而凭假印信就能多次冒支如此巨额款项，也足以说明当时朝中各级官吏对所司之职之不负责任，这些只求个人享乐的官吏遍于朝中，奸蠹之吏才有机可乘，库银的大量流失才成为可能。

至于嘉庆朝地方官吏贪污公款勒索百姓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两淮盐政征瑞"欲结交取悦冀图和珅常为庇护，可久留两淮盐政之任不复更换，籍以便私图，自肥囊橐。"⑮将二十万两白银馈送给和珅，而和珅竟嫌少不收，暗示他要增至四十万两。此外，他送给和珅的"缎匹物件奇巧之物，不计其数。"和珅退回的二十万两白银，后来征瑞完全为其子捐官，开设店铺所用。显然，这二十万两白银是两淮地区盐税所得，是应该上缴国库的，而征瑞则将其归为私有。

漕粮是当时由关内各省调运到北京俸饷之用的官粮，其运输主要通过河道。有漕省分的州县官吏和漕监则因此为利，他们把漕粮视为肥己之宝。在粮食产地他们不顾按亩征收漕粮的法令，继续实行屡经禁革的踢斛、淋尖的陋规。每石漕粮有加至数斗甚至有成倍收取的。若不肯交纳"则稽留以花其食用，呈验以狼籍其粒，使之不得不委曲听从。"⑲为防止上司查究他们就巨额行贿，为防同僚告发他们就坐地分赃。由于"官吏因有浮收被挟制不能不通融收纳"，"帮办旗丁因见米色不纯遂尔籍端需索。"每条船由一百二十两增至二百两，稍不满欲即百般刁难，不肯放行。若满足私欲，即使有掺杂之米也全部收下。在粮食运输途中："运弁以挑剔米色为词刁难、勒措，及催漕运弁沿途俱有需索。而抵通后仓场衙门又向弁丁等勒取使费，层层剥削锱铢皆取于民。"⑰漕运之弊上殃清廷下害百姓而地方官吏用种种手段中饱私囊。"下怨上尤，互相诟病，而皆不为无因，其病民蠹官，大为漕害者，则相沿之陋规是已。"⑱

漕运之弊骇人听闻，而它较之当时的河工之弊又相形见绌。嘉庆一朝河患频仍，国之投帑到十六年已达三千余万两，河道两岸民工历年不计其数。然而由于治河官吏偷工减料分肥入己，使已竣之工一遇大汛坍塌淤陷之事频繁发生。致使新工未竣，旧工复发。嘉庆一朝二十五年间，仅见诸文字记载的河工大患就发生了十七次。为此，嘉庆十六年曾派托津、初彭令调查治河官吏贪污一事。由于作案手段高明，最初查帐簿并无差错，经嘉庆降旨切责，深入详查才发现，帐簿已全部经过篡改、捏造。经他们到治河工段一一查验并将各年文卷印签反复核对，这才发现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十四年有六十万两工费不知去向，十四年、十五年黄河运河治河款计十万六千余两仍未报帐。至于其他贪占事例不胜枚举。如此贪污汇聚一朝何国不贫；如此吏风横行于世何国能盛？难怪当时湘鄂百姓称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为"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⑯足见当时吏风之一斑。

三

嘉庆时期各级官吏不仅在经济上表现出极大的贪欲，做出了种种亘古罕见的丑恶表演，使一朝吏风腐败不堪，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在乾隆末年已呈下降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崩溃。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官吏与官吏之间，官吏与皇帝之间也存在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矛盾。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各自为政各行其事为所欲为，对于朝廷的法令置若罔闻，就是皇帝的话他们也是阳奉阴违仍我行我素。他们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泄私忿达己私欲视军国大事如同儿戏，以致使嘉庆朝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使衰败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嘉庆四年陕西巡抚永保与甘、川、楚、豫、陕副都统明亮在华林山会剿张汉潮起义军时，永保因在湖北"剿贼无功，坐谴"而"明亮老于用兵，资望为诸将军"⑳引起永保的嫉妒。在围剿义军过程中"与明亮不相能，汉潮往来奔窜，不以师应。"㉑这次永保带二千兵卒驻于半山，张汉潮伺机分两路上、下夹攻，形势岌岌可危。而驻于距此仅七十里的明亮得到救援的消息后则按兵不动，幸亏马兆瑞闻讯带兵赶来救援，才幸免全军覆没。事后两人相见，明亮责备永保不应"冒昧打仗，损兵折将与伊无涉"，永保要参奏明亮顿兵不救，明亮要参奏永保败丑失事，彼此大加争闹。㉒不久在凤县镇压起义军时，义军明明向北撤退，而明亮则以绕道截击为名带兵南去，义军乘机顺利撤离。对此嘉庆十分恼火，一再诘问他们为什么重兵在陕围剿义军"半载有余尚未蒇事"。明亮奏答道："若遇庆成、永保带兵前来即可合围奋击"。而永保的奏折却说如果明亮前来"即可併力合剿"。㉓彼此推卸责任忌功树党，互相倾轧。随着矛盾的加深，以致发展到彼此不相见面、互不通信息，遇有战事也带兵避之的程度。嘉庆四年八月初一日，明亮追剿张汉潮义军来到商州，按计划永保本应会同围剿，可他却带兵折回西北。当明亮追剿义军到兰田，永保又带兵赶往北方。其目的仅仅是为了"避明亮不与相见"，而将清廷所授重任置之度外，为义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在这次围剿张汉潮义军的战役中，永保带兵六千，由于他时时注意以躲避明亮为主，的确达到了他不与明亮晤面的目的。而身受枪伤孤军作战的张汉潮，在几万清军用半年多时间的围剿之下，由于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安然无恙。为此，嘉庆谕曰"似此怀挟私见，坐误事机，全不顾剿贼重务，庆成、永保可谓丧尽天良……一任伊等耽延贻误，何时方能剿净"。㉔这种同僚间视如寇仇玩误军机的事情不仅在湖北的统兵大员中存在，其他地方如陕西、四川等地也很严重。为此，嘉庆申谕曰："前此明亮永保等遇公事则彼此观望，于私忿则互相倾轧，似此猜疑交构，人各一心，将士岂能用命。即现在之统兵大员如额勒登保、那彦成、松筠等亦皆各顾各路，彼此不相知会，以致此处余匪未能剿尽，而他处之贼又复乘间蔓延。彼此各存私见，甚至不相上下，互相推诿，不能和衷"。㉕致使清廷动用几十万大军，耗用几千万两白银，费时九年才平息了川、楚、陕三省的白莲教起义。而尽管败仗频连，各路将帅为求官禄则虚报战功向朝廷邀功请赏。"各处奏捷章疏，如击败贼兵，功称斩杀甚多，或云数千，或云万余，或云不计其数。甚至贼弃空城尚云如何攻取、如何恢复，妄行虚报，微功小谴，妄行铺张"。㉖使清王朝无法掌握镇压义军的情况，因此，尽管清廷兵有百万之众，三省农民起义之火仍是长燃八年而不熄，使清王朝的统治受到强烈的震撼。而这起义的根源，也正是由于在当时腐败的吏风之下，各级官吏为肥己私囊足己私欲如狼似虎的横征暴敛，才迫使人民大众铤而走险，举行种种形式的起义。而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国力、财力又被如水般

空耗掉，使嘉庆朝跌入衰败的泥潭而无力自拔。

官官之间敌者视如寇仇互相倾轧，友者则相互庇护，欺上瞒下。这种败坏的风气使清王朝治理吏风调查案件又遇到重重阻力。嘉庆六年八月，初彭令奏报黔省巡抚伊桑阿骄纵勒索、贪黩营私贻累地方的种种劣迹。嘉庆遂令满州大臣、宗室琅玕调查此案，结果琅玕不但不将伊桑阿的种种劣迹举劾上奏，反替其申辨。经查究初彭令之奏正是琅玕"自铜仁回滇时在郎岱地方与初彭令会晤告知。"㉗这种荫庇同僚、蒙蔽朝廷、结党营私的风气在嘉庆时期十分盛行，足见风气败坏之一斑。吏风腐败对嘉庆朝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796至1820这二十五年中，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较大规模的有二十余起，南北水患也频繁发生，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十余起。㉘而贪吏的蚕食，将官们的玩误空耗，种种执权者的层层盘剥，又进一步动摇了已经衰弱的经济基础。也正是由于吏风的腐败，才使广大劳动人民在本已沉重的苛捐杂税之下，又增加了无穷的新项目。以致于到了难以存活的地步，留给他们的只有举行起义这唯一的出路，而镇压起义又要耗用大量的库银。嘉庆一朝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翻过了历史的篇章。

---

①魏源，《圣武记》卷七。

②《清史稿》列传150.阿桂传。

③④⑳印鸾章：《清鉴》卷九。

⑤⑥⑭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二，第50、76、276、235页。

⑦《清史稿》列传160。和珅传。

⑧《东华续录》嘉庆36；18年9月庚辰。

⑨⑪《仁宗实录》嘉庆四年十月丁酉．嘉庆四年九月庚辰。

⑩《仁宗实录》嘉庆九年八月己未。

⑫《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九月庚辰。

⑬《仁宗实录》嘉庆十年六月戊寅。

⑮《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三月戊辰。

⑯《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三月丁卯。

⑰《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七月乙亥。

⑱《清代野史》七辑《栖霞阁野乘.漕弊》。

⑲《清稗类钞.讥讽类》。

⑳《清史稿》列传170.明亮传。

㉑《仁宗实录》嘉庆四年八月壬寅。

㉒㉓《仁宗实录》嘉庆四年八月己酉。

㉔《仁宗实录》嘉庆五年正月壬戌。

㉕《仁宗实录》嘉庆五年六月上丙辰。

㉖《仁宗实录》嘉庆六年庚戌。

㉗《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九月癸未。

㉘参见《清史稿、仁宗本纪》，印鸾章《清鉴》、《清实录·仁宗实录》，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